

https://farid.ps/articles/how_israel_dodges_icc_jurisdiction/zh.html

以色列如何规避国际刑事法院（ICC）的管辖权

如果负责起诉世界上最严重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ICC）对一个国家的狡猾规避无能为力，会发生什么？以色列已将ICC的互补性原则转变为一道盾牌，通过虚假调查阻挠独立调查。本文揭露了以色列如何利用这一法律漏洞，强制执行一种优先考虑暴力定居者而非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双重司法体系，并依靠美国制裁——通过SWIFT、万事达卡/Visa和禁飞名单瘫痪ICC法官。Hind Rajab和拉法医护人员大屠杀揭示了这一策略的深度，迫切需要国际行动。

利用互补性原则

ICC的互补性原则载于《罗马规约》第17条，仅在国家“不愿意或无法”对其管辖范围内罪行进行真正起诉时允许干预。以色列以冷嘲热讽的方式利用这一条款，通过进行表面化的内部调查作为幌子，阻碍ICC的监督。2024年1月的Hind Rajab大屠杀和2025年3月23日的拉法医护人员大屠杀是这一策略的例证。在Hind Rajab案中，以色列国防军（IDF）最初否认任何参与，声称在一名6岁女孩及其家人被坦克炮火杀害、派往救援的救护车被摧毁并导致两名医护人员死亡的地点附近没有部队。仅在视频证据和Forensic Architecture的独立调查证明IDF坦克负有责任后，IDF才承认“错误”，但未提起刑事指控——仅进行了一次免除士兵罪责的初步审查。同样，在拉法大屠杀中，IDF虚假宣称人道主义车辆“可疑”且与哈马斯有关，在类似处决的袭击中杀害了15名救援人员，包括巴勒斯坦红新月会（PRCS）和联合国工作人员。视频证据随后驳斥了这一说法，迫使IDF承认错误，但2025年4月20日的调查仅得出“职业不当行为”的结论，撤职了一名副指挥官并对另一人进行纪律处分，而没有刑事责任。

这些调查既不独立也不严谨，依赖于士兵的自辩证词，同时忽视受害者证据和人权报告。IDF的模式——在2008-2009年加沙战争后启动47次调查，起诉率低于1%——凸显其不愿真正起诉。以色列还挑战ICC的权威，质疑巴勒斯坦的国地位，尽管其于2015年加入《罗马规约》，这一立场被预审分庭一号于2024年11月21日驳回，确认了管辖权并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2025年6月5日由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宣布的对ICC法官的最新美国制裁加剧了这种规避行为。这些措施针对法官索洛米·巴伦吉·博萨、卢斯·德尔·卡门·伊巴涅斯·卡兰萨、雷恩·阿德莱德·索菲·阿拉皮尼·甘苏和贝蒂·霍勒，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并实施旅行禁令，可能通过SWIFT网络冻结其银行账户并暂停万事达卡/Visa服务，如检察官汗的访问受阻案例所示。这种美国支持，植根于主权主张，延迟了ICC的程序，巩固了以色列的规避行为，将其作为故意滥用互补性原则以逃避对记录在案的暴行的司法追责。

不同的司法标准：巴勒斯坦人与暴力定居者

以色列的司法系统作为压迫工具，强制执行一种双重法律制度，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在被占领土上平等保护的授权。包括12岁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人受制于军事化的法庭系统，该系统以严厉措施惩罚投掷石块等轻微罪行。巴勒斯坦儿童保护组织报告称，每年有500-700名儿童被拘留，遭受暴力、单独监禁和无法律代表的强迫认罪，如人权观察2015年关于安全部队虐待的报告中所记录。2022年，137名儿童被拘留，2023年出现致命激增，包括据《卫报》2024年揭露的狙击手杀害未成年人事件。这些案件往往导致监禁，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岸超过70万的暴力以色列定居者在民法下运作，享有土地掠夺和袭击的豁免权。B'Tselem 2021年的报告《犹太至上政权》详细描述了武装并受IDF前哨站支持的定居者通过纵火、殴打和谋杀夺取西岸50%以上的土地。2015年杜马纵火袭击杀死了一个巴勒斯坦家庭，经过多年拖延，仅有一名定居者被定罪，其他人逃脱了司法追责。Addameer 2023年的报告确认，军事法庭将定居者排除在外，后者受益于宽松的民事程序或根本没有程序，最高法院将土地没收作为“安全”措施予以批准。这种差异巩固了一个种族支配体系，明显违反了《罗马规约》中对种族隔离的定义。

案例研究：Hind Rajab和拉法医护人员大屠杀

Hind Rajab和拉法医护人员大屠杀是以色列规避策略的鲜明例证。2024年1月，6岁的Hind及其家人在加沙城被IDF坦克炮火杀害，救援救护车的尝试也成为目标，医护人员优素福·泽诺和艾哈迈德·马杜恩被杀。IDF谎称现场没有部队，直到Forensic Architecture 2024年的调查，得到视频和音频证据支持，证明坦克从13-23米处开火。没有提起刑事指控——士兵以“职业不当行为”为借口被免责。同样，2025年3月23日的拉法袭击中，包括PRCS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内的15名救援人员在对救护车和联合国车辆的袭击中被处决。IDF虚假宣称与哈马斯有关，但一名医护人员的手机视频揭露了谎言，显示车辆在灯光亮起时遭到射击。2025年4月20日的调查仅发现“职业失败”，撤职了一名副指挥官而没有刑事责任，尽管尸检确认了故意杀人。

这些案例突显了以色列的模式：谎称直到无可辩驳的证据出现，然后进行虚假调查以免除肇事者责任，利用互补性原则阻挠ICC管辖权。美国对ICC法官的制裁，干扰他们的财务和旅行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豁免权，使法院无力采取行动。

法律依据与国际影响

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种族隔离公约》和《罗马规约》，后者将种族隔离定义为一个种族群体对另一个的系统性压迫。人权观察2021年和国际特赦组织2022年的报告得出结论，以色列的政策达到这一门槛，引用了歧视性法律、行动限制和谋杀。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2022年确认了被占领土上的种族隔离，以色列将其驳斥为政治性的。ICC无法推翻这些虚假调查——尽管有2024年的逮捕令——因美国制裁而加剧。SWIFT网络在美国管辖下，迫使全球银行冻结法官账户，而万事达卡/Visa暂停信用卡服务，禁飞名单限制旅行，如汗的案例所示。ICC和联合国谴责这是对司法的攻击，欧盟提议制定阻止性法规，但以色列的规避行为仍在继续。

以色列规避ICC管辖权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策略，滥用互补性原则以维持一个压迫巴勒斯坦人、保护定居者和士兵的双层法律体系。Hind Rajab和拉法大屠杀，伴随着暴露的谎言和罪责豁免，以及美国制裁瘫痪ICC法官，是这一政权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要求独立调查、实施反制裁并执行ICC逮捕令——以拆除这种类似种族隔离的结构，为受害者伸张正义。